

風景與焦慮：

柳宗元永州所撰山水遊記與辭賦之對讀

許東海*

摘 要

本文主要依據柳宗元〈囚山賦〉等永州時期相關賦辭賦，重新審視柳宗元永州八記中閃躲於風景書寫背後的羈囚身影及其精神焦慮。從而檢視柳宗元永州八記與〈囚山賦〉等辭賦對照中的閱讀疑惑，究竟是作者前後創作態度的搖擺不定，亦或竟是柳宗元藉由永州山水書寫所發出的羈囚焦慮及其心海呼喚。永州八記對於柳宗元而言，不僅是一幅幅永州山水繽紛奇麗的風華再現，就其創作旨趣而言，更是一場藉由山水書寫及其文學演繹，並攸關謫宦逐臣與楚客羈囚所經緯交織的士人焦慮主題。藉由進一步將這兩種文類對照與整合的書寫重構，並輔以相關的柳氏書札等文獻資料，則柳宗元潛藏於永州八記山水書寫背後的謫囚焦慮，不僅得以一一浮現，並且從而亦映射出作者於山水實景的敘寫當中，曲折而深刻的謫囚心影。這些構成了永州八記游移於風景與焦慮二者之間的特殊書寫姿態。亦從而凸顯永州八記與永州辭賦二者間互為表裡的特殊重要關係。

2004.3.25 投稿；2004.4.15 審查通過；2004.5.4 修訂稿收件。

* 作者現職為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關鍵詞：柳宗元、永州八記、辭賦、謫囚、焦慮

**Scene and Anxiety:
The Comparatively Reading between Liu Zongyuan's
Scene Essays and Cifu in Yongzhou**

Hsu Tong-hai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thinks Liu Zongyuan's exile anxiety during his Yongzhou period mainly based on Liu's literature work created in Yongzhou such as "Chou-shan fu" etc. And this article also attempts to explain the readers' doubt, which may happen when readers correlately read his works created in Yongzhou period, whether Liu's creation attitude changes all the time or he just wants to abreact his exile anxiety by Yongzhou's scene writing. "Yongzhou eight essays" for Liu is not only a splendid representation of Yongzhou's scene but also a landscape and literature performance which enweaves the theme of exile anxiety of Chinese traditional intellectuals. Through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two forms of literature and the information of Liu's documents, Liu's exile anxiety hiding behind the scene writing emerges and refracts his mind. These points not only construct the special writing position from scene to anxiety but also reveal the importance of the intertextuality relationship between "Yongzhou eight essays" and Yongzhou cifu.

Keywords: Liu Zongyuan, Yongzhou eight essays, cifu, exile, anxiety

一、緒論：文類整合與心靈巡禮

永州八記就作者柳宗元而言，是謫居生活的重要紀錄與經典創作，然若進而將永州八記置放於中國山水文學傳統的書寫譜系中，卻更能突顯出柳宗元的獨特貢獻與特殊地位。其中最值得注視的，並不在他對於永州山水風貌神韻的靈會妙賞與鈎深抉微，而在於他以永州八記為代表的山水遊記中，在若即若離適如其分的筆墨中，巧妙地展現出永州風景與作者焦慮二者密合無間地獨特山水書寫。而且柳宗元在這一系列以謫居遊記為主要書寫型態的永州山水巡禮中，充塞著一場作者撲朔弔詭，已至於接近正言若反的語言陷阱與文字遊戲，於是讀者若從這一另類視界重新進入柳宗元的永州八記系列創作，應該可以重新地發覺永州八記應不僅止於作為柳宗元的一場永州山水遊賞的風華再現，實際上更是作者游刃有餘所展演的一場山水文學的藝術創意與文學戲法，從而進一步地透露並揭示出作者謫居永州十年精神上的深層焦慮；換言之，若我們能在過往學界以柳宗元永州八記為山水遊記視角的詮釋基礎上，進一步對應並結合柳宗元於永州八記中巧妙操弄並展開的語言及文學遊戲技法觀察，則應可有助於揭開柳宗元山水文學經典永州八記的特殊創作樣態及其與辭賦間的對應意涵。

尤其是〈永州八記〉中迥異於屈騷以下山水書寫愛憎分明的傳統基調及其創作範式的另類變創。柳宗元山水遊記中這一特殊問題與全面性論述，筆者將另撰專文論述；至於本文所要優先處理與討論的是，柳宗元的山水文學中涉及上述面向與命題的一個具體事例，亦即柳宗元於永州八記中的山水書寫，從其一系列的整體山水書寫而言，主要彰顯出作者謫居永州時期因憂而遊的山水巡覽，而永州山水帶給柳宗元本身的情感基調，亦處處洋溢著驚奇、陶醉與快樂等主要情懷，換言之，閱讀永州八記常會予人山水頓時銷解作者貶謫的精神陰霾，並同時讓他獲得身心受創後的平撫與療養等基本印象。於是在這謫居永州的前後十年期間，從〈始得西山宴遊記〉篇末「然後知吾嚮之未始遊，遊於是乎始。」的陶醉神會與樂山喟嘆，到〈鈞錫潭〉的「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鈞錫潭西小丘記〉之「獨喜得之」、〈石澗記〉之「古之人其有樂乎此也」等等皆令讀者不禁發悠然神往之想。然而當閱讀作者另一

篇撰於謫居永州十年，展現柳宗元永州山水觀照，並且具有總結旨趣性質，且歷歷明示厭山基調的〈囚山賦〉時，不免疑惑於柳宗元永州八記與〈囚山賦〉情志基調之矛盾，而作為展現柳宗元的內心世界而言，兩者真偽如何分辨？尤其是作於謫居永州十年最後期間的〈囚山賦〉，從其「體物寫志」的終極旨趣而言，¹即所謂「積十年吾省者兮，增蔽吾以蓬蒿。……誰使吾山之囚吾兮滔滔」。²因此〈囚山賦〉應可視為柳宗元永州謫居生涯裡山水觀照的最終告白與深層底蘊，然則作為柳氏山水經典之作的永州八記，是否意味著將隨之卸下幽麗與愉悅的山水面具，從而淪為柳宗元創作世界中自欺欺人的一場山水文學騙局，而讀者亦將自柳宗元所虛構的永州山水美夢中愕然驚醒，以至落荒而逃？換言之，就讀者而言柳宗元同撰於永州之山水遊記系列與〈囚山賦〉兩者間究竟是一種真偽實妄間誓不兩立的情志抉擇，抑或彼此混合，相輔相成的對應關係。

對照永州最後階段的〈囚山賦〉而言，永州八記展示的正是柳宗元永州十年的羈囚焦慮及其精神困境，而在此一觀照之下，所有表面看似對立相反和矛盾如樂山、厭山情志取向，其實正可一一消融化解，並從而在相得益彰的對應互補中，密合無間地建構出柳宗元永州八記於山水風景書寫之外，深烙羈囚影像的深層焦慮世界。因此就這一意義而言，撰於永州最後階段的〈囚山賦〉對於揭開並深入柳宗元永州山水遊記的真正精神國度，便成為重要的具體關鍵；同時柳宗元的這一深層羈囚意識，亦曾反映於作者撰於謫居永州四年左右〈與李翰林建書〉裡，可見羈囚意識具體與柳宗元謫居永州十年相終始，此亦足以作為重新凝睇永州文學中山水觀照及其羈囚寫照的另一旁證。因此從重新細讀柳宗元的山水遊記，便成為必要而且不可忽略的重要考察門徑。

本文即主要依據〈囚山賦〉與永州時期相關賦，並結合〈與李翰林建書〉等相關文獻，重新審視柳宗元永州八記中閃躲於風景書寫背後的羈囚身影及其精神焦慮，從而對柳宗元永州山水遊記的書寫特色及其表現風貌，探索出另一可能的解釋途徑。而對於柳宗元的相關學術論述例如林紓《柳文研究法》，固然已注意及〈囚山賦〉所揭示的厭山訊息，但並未深入指出羈囚意識是否乃為柳宗元永州生活末期思想的最後新

¹ 〈詮賦〉謂：「賦者，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文心雕龍》劉勰撰，陸侃如、牟世金譯註（濟南：齊魯書社，1996），頁159。

² 參見柳宗元〈囚山賦〉，《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2）卷569，頁5758。

變或前後一貫，亦未能進一步結合永州八記的山水遊記文本，作較為具體細密而深入的論述。故本文即嘗試由羈囚意識及其精神焦慮出發，剖析柳氏永州八記山水書寫的深層底蘊，從而檢視柳宗元永州八記與〈囚山賦〉等對照中的閱讀疑惑，究竟是作者前後創作態度的搖擺不定，亦或竟是柳宗元藉由永州山水書寫所發出的羈囚焦慮及其心海呼喚。於是從上述柳宗元永州八記山水巡禮的基本面貌之外，更引人入勝的應更是作者山水遊記字裡行間的心靈影像及其情志底蘊；換句話說，永州八記對於柳宗元而言，不僅是一幅幅永州山水繽紛奇麗的風華再現，就其創作旨趣而言，更是一場藉由山水書寫及其文學演繹，並攸關謫宦逐臣與楚客羈囚所經緯交織的士人焦慮主題。

二、謫臣夢魘：〈始得西山宴遊記〉與〈囚山賦〉、〈夢歸賦〉標示的心靈圖景

柳宗元因參與之王叔文政治變革終告挫敗，被貶為永州司馬。而永州八記即撰於謫居永州十年當中，此間柳宗元貶謫的心理取向，應是深入探索永州八記的重要基礎與必要門徑³。柳宗元永州的十年貶謫，是否於其精神國度裡始終存在難以揮去長安謫囚的沉重陰霾，應是值得關注的重要線索；其次，撰於憲宗元和四年的〈與李翰林建書〉，乃撰於永州謫居的中期左右，柳宗元於書信中曾自我剖析山水遊覽及其貶謫心境：

永州於楚為最南，狀與越相類，僕悶及出游，游復多恐，……
譬如囚拘圜土，一遇和景，負牆搔摩，伸展肢體，當此之時，
亦以為適，然顧地窺天，不過尋丈，終不得出，……豈復能
久為暢哉。⁴

其中作者的羈囚意識歷歷如繪；因結合上述分別作於永州貶謫中期與末期的柳氏兩篇創作文獻來看，大體可以得出如下初步結論，亦即對於柳宗元本身而言，長安謫放所形成的謫囚陰影及其夢魘，實際上並未隨著時間的推移，漸次揮別、消解；反之，這一羈囚意識確如影隨形地與柳宗十年謫居生涯長相終始。

³ 參見羅聯添先生〈柳宗元兩篇山水記分析〉，氏撰《唐代四家詩文論集》（台北：學海出版社，1996），頁275-287。

⁴ 參見柳宗元〈與李翰林建書〉，《全唐文》（同註2），頁5794-5795。

然而藉由〈囚山賦〉、〈與李翰林建書〉創作時間所獲得的柳宗元永州謫居心境，固然有助於永州八記創作背景與作者心理的掌握，然則撰於此一時期的山水遊記旨趣就不僅止於純粹因憂而遊的情志意涵，即藉由山水遊賞，以消解苦悶的文學創作，然而作為柳氏賞心悅目的山水遊記，是否亦在其中寓涵了作者深刻而曲折的羈囚意識，這一層問題為過往柳宗元相關研究論述所忽略，以下即針對作為一位謫囚身份的柳宗元，如何在永州的山水遊記裡，所形塑的客寓焦慮之文學論述，進而展現其山水文學獨特的變創旨趣。其中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基於長安謫放所深烙於山水遊記中的楚客夢魘，而且這一書寫特質，不時閃現於永州八記的字裡行間，從而形成其六朝以來山水文學因憂而遊的傳統範式外的載憂載遊，甚至於始遊終憂的特殊山水變創書寫樣態。

柳宗元永州八記主要分別完成於元和四年與元和七年兩個階段，包括前期展開的〈始得西山宴遊記〉、〈鉅鰕潭記〉、〈鉅鰕潭西小丘記〉、〈至小丘西小石潭記〉四篇山水遊記，與後期由〈袁家渴記〉、〈石渠記〉、〈石澗記〉、〈小石城山記〉所貫串的山水遊蹤。⁵故自其創作期間而言，永州八記大致符合前引柳氏〈與李翰林建書〉與〈囚山賦〉的元和四年之後，元和十年之前相符。而且從永州八記之首的〈始得西山宴遊記〉開始，長安影像與謫放陰霾，便自始至終未嘗自柳宗元的精神世界裡隨風而逝，反之成為柳氏山水遊賞背後沉重的精神負荷，從而構成其掩抑於永州八記山水風景之謫囚焦慮。其中主要的具體表現型態如下：

（一）罪囚身份與惴慄心境

柳宗元〈始得西山宴遊記〉篇首即開門見山自陳長安謫放的罪囚身份及其山水遊覽之際的基本情愫：

自余為僇人，居是州，恆惴慄。⁶

這不僅是作者〈始得西山宴遊記〉創作心境的定調與告白，實際上可延展為永州山水漫遊的深層掩抑。換言之，撰於謫居永州四年左右的〈始得西山宴遊記〉映射出柳宗元精神意識仍然深烙罪囚印記，於此可見四

⁵ 事實上柳宗元謫居永州的山水遊記，尚有撰於元和八年出遊永州之東黃溪的〈遊黃溪記〉，但因向來或以其地理位置特殊而獨立一篇，未歸屬於永州八記之列。上引論述參見鄭良樹〈柳宗元的永州雜記〉，氏撰《辭賦論集》（台北：學生書局，），頁 219-228。

⁶ 參見柳宗元〈始得西山宴遊記〉，《全唐文》（同註 2），頁 5870。

年前的長安謫放與罪囚夢魘，一如往昔糾纏於柳宗元的靈魂深處，揮之不去。至於文末歸旨於所謂「然後知吾嚮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則不應僅如作者所說單純源自這趟山水之旅之「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的自然推論，亦即作者既認為前此四年之永州謫居，誠如文中自剖的「未嘗游」，其間未遇風景奇麗如西山者，或為原因之一，但卻更凸顯並印證永州四年以來作者久困於「僇人」陰霾之下的謫放心境，然則今日這一場西山宴遊之謂「始得」，更曲折地透露出柳宗元益於往昔的的驚艷心情，彷彿邂逅桃花源或發現新大陸。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柳宗元所謂「游於是乎始」，乃是擺脫長安謫放與罪囚陰影的重生宣告，而僅能視為柳宗元已然在永州山水中找到向外探索的一道心靈窗口，擺脫長久以來自我禁錮、封鎖，以致窒息的陰霾，盡情享受雖短暫卻亮麗的窗外風景。而柳宗元撰於同年的〈與李翰林建書〉適足成為解開〈始得西山宴遊記〉中融合風景與羈囚論述的重要鎖鑰：

譬如囚拘圜土，一遇和景，負牆搔摩，伸展支體，當此之時，亦以為適。⁷據此可印證柳宗元謫居永州數年以來，深陷罪囚身份認同與自我心靈禁錮的精神困境。

至於柳宗元〈與李翰林建書〉所謂「著書數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遠寄，但用自釋。」⁸其中「心病」應主要指涉他心理上對於長安謫放所籠罩的羈囚陰霾，而這一「心病」又與他謫居四年生理上的痞疾纏身輾轉交攻。誠如此一書信亦言：

自去年八月來，痞疾稍已，往時間一二日作，今一月乃二三作，用南人檳榔餘甘，破決壅隔大過，陰邪雖敗，已傷正氣，行則膝顫，坐則脾痺，所欲者補氣豐血，強筋骨，輔心力，有與此宜者，更致數物，忽得良方偕至，益喜。永州於楚為最南，狀與越相類，僕悶及出游，游復多，恐涉野則有蝮虺大蜂，仰空視地，寸步勞倦，近水即畏射工沙蟲，舍怒竊發，中人形影，動成瘡痛，時到幽樹好石，暫得一笑，已復不樂。何者，譬如囚拘圜土，一遇和景，負牆搔摩，伸展肢體，當

⁷ 參見〈與李翰林建書〉，《全唐文》（同註2），頁5795。

⁸ 參見柳宗元〈與李翰林建書〉，《全唐文》（同註2），頁5795。

此之時，亦以為適。然顧地窺天，不過尋丈，終不得出，豈復能久為舒暢哉。明時百姓，皆獲歡樂，僕士人，頗識古今理道，獨愴愴如此，誠不為理世下執事，至比愚夫愚婦，又不可得，竊自悼也。僕曩時所犯，足下適在禁中，備觀本末，不復一一言之。今僕癯殘頑鄙，不死幸甚，苟為堯人，不必立事程功。雖欲為量移官，差輕罪累，即便耕田藝麻，取老農女為妻，生男育孫，以共力役，時時作文，以詠太平。摧傷之餘，氣力可想，假令病盡，已身復壯，悠悠人事，越不過三十年客耳。前過三十七年，與瞬息無異，復所得者，其不足把翫，亦已審矣。杓直以為誠然乎，僕近求得經史諸子數百卷，嘗候戰慄稍定時，即伏讀，頗見聖人用心，賢君子立志之分，著書亦數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遠寄，但用自釋。貧者士之常，今僕雖羸餒，亦甘如飴矣。足下言已白常州煦僕，僕敢眾人待常州耶，若眾人，即不復煦僕矣。然常州未嘗有書遺僕，僕安敢先焉，裴應叔蕭思謙各有書，足下求取觀之，相戒勿示人，敦詩在近地，簡人事，今不能致書，足下默以此書見之，勉盡志慮，輔成一王之法，以宥罪矣。不悉某白。⁹

如此身心俱疲的永州謫居應俱是〈與李翰林建書〉所以有「囚拘圖土」之慨的主要緣由。其次，〈始得西山宴遊記〉固未必即撰成於〈與李翰林建書〉之前，而為該書信中所稱「著書亦數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遠寄，但用自釋。」一類作品¹⁰，但大體既為同年所作，又復明顯指涉罪囚意識，因此兩文應具有彼此繫聯交涉，並互為發明的重要關係。因此從〈囚山賦〉、〈與李翰林建書〉、〈始得西山宴遊記〉來看，不僅是柳宗元永州八記中之最早撰作，更奠定他永州山水深刻羈囚意識的創作基調，從而為揭開柳宗元永州八記書寫底蘊的首一文學面紗。

⁹ (同註2), 頁5795。

¹⁰ 據柳宗元於〈始得西山宴遊記〉中所說，「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遊西山乃是十月前後之事，因此從歲末餘三月而言〈與李翰林建書〉撰於十月到十二月間的機會似乎不多，但亦難確認必此前之作。

(二) 醉夢書寫與罪囚塊壘

〈始得西山宴遊記〉為柳宗元永州八記的創作基調。其中值得關注的是，作者開宗明義地指出「自余為僇人，居是州，恆惴慄。」之後，便直指永州山水漫遊的實際情況：

其矜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谿，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臥而夢，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¹¹

所謂「傾壺而醉」、「臥而夢」，對照篇首段關鍵文字來看，絕非僅止於尋常人家因一時山水之美，望情陶醉；反之，柳宗元既以罪囚身份自居，而作西山之遊，則其「頹然就醉，引觴滿酌」，以致出現「意有所極，夢亦同趣」的情節發展，其中應具有藉醉酒以澆胸中謫放塊壘的另類意涵，在此之下，醉酒對於柳宗元恰如一劑麻醉，而「意有所極，夢亦同趣」則不妨可以視為作者對於永州謫囚夢魘的具體逃脫途徑；換言之，一旦脫離山水之間的醉酒夢鄉，復歸夢醒人生，就如同讓自己重新跌回羈囚夢魘的另一世界，因此對於柳宗元文末歸結於「猶不欲歸」的意涵，就應不囿於流連美景之際，不忍遠去的一般表層意涵。亦可見長安謫放陰影應始終如影隨形地依附於柳宗元的山水遊記，從而形成其中特殊的觀照視角，映射出〈始得西山宴遊記〉中柳宗元羈囚寫照的另一側影。其中有關柳宗元永州撰述中之生命夢想，亦不難由同期所撰〈夢歸賦〉窺見箇中消息。此賦所揭示的永州之夢，即清晰地指涉柳宗元渴望擺脫僇人謫囚的身份與困境，並以脫胎換骨之姿重返長安政治場域的深層意識。例如：「罹擯斥兮以窘束兮，予惟夢之為歸，精氣注以凝涎兮，循舊鄉而顧懷，夕予寐於荒陬兮，心慊慊而莫違。」、「忽崩騫上下兮，聊校行而自抑，指故都以委墜兮，瞰鄉閭之修直。」據此，永州謫囚誠為現實中已然降臨的夢魘，反之，重返長安的家國追夢適成為擺脫當下困境的心靈出口與憂遊隱喻。

¹¹ 參見柳宗元〈始得西山宴遊記〉，《全唐文》（同註2），頁5870。

三、山水焦慮：永州八記與〈夢歸賦〉、〈囚山賦〉的困境書寫及其仕途焦慮

(一) 山水困境與長安情結

柳宗元的謫囚情結，其實主要根源於長安所象徵的君王及其權力中心，因此對他而言，從長安到永州的地理位移，其實正是另一座政治煉獄的變形與置換。因此由這一面向而言，永州的山水其實不應僅僅視為大自然的心靈饗宴，同時卻更是一幕幕獄窗之外所展開的風光景色，因而我們可以發覺在永州八記山水風景裡，不時閃現的長安形影及其相關意象，並且在撫今追昔的宦海浮沉與仕途省思裡，具體而微地映現出柳宗元羈囚南楚的精神焦慮之一。

永州八記之首〈始得西山宴遊記〉開宗明義地揭露柳宗元永州山水的身分認同與創作立場，從其展現情志之關注空間而言，即是由長安座標與永州山水兩者所牽引召喚而出的一道心路軌跡。而這正映現出作者力圖閃躲乃至掩抑於山水風景書寫下的罪囚情結。但潛隱於柳宗元〈始得西山宴遊記〉中這一創作伏筆，到他往後陸續撰寫的山水遊記裡，雖然基本上仍不脫含蓄蘊藉的表現手法，但整體而言，已較〈始得西山宴遊記〉顯示出漸趨明朗的轉變取向。

〈鈇鉞潭記〉中的長安指涉，即具體藉由鈇鉞潭與長安故土兩地點間所建構的心靈線索，作為文末的終極旨趣，作者所謂：「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正是透過具體而微的永州山水書寫對照出柳宗元早已深植靈魂深處，並具重要位置意義的長安座標。可見在永州山水的世界裡，由長安所隱喻的謫囚情結指涉，其實更是柳宗元潛藏於山水風景背後的心靈圖景與情志真相。所謂「樂居夷而忘故土者」實為正言若反的語言技巧，是故就其情志意涵而言，僅能視作一時苦中作樂。

稍遲於〈鈇鉞潭記〉撰寫的〈鈇鉞潭西小丘記〉，其中以長安指涉謫囚情結益形明朗，而且相對於〈始得西山宴遊記〉或〈鈇鉞潭記〉蜻蜓點水而又欲言還止的表達筆法與委婉取向，令人明顯感受到此文風起雲湧，甚且呼之欲出的長安情思。這一特質主要具現於前後三度出現的相關書寫：

丘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

噫！以茲丘之勝，致之澧、鎬、鄆、杜，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

而我與深源、克己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所以賀茲丘之遭也。¹²

文中所謂「唐氏之棄地」，應是以姓氏指涉李唐君朝，而丘之「貨而不售」則為柳宗元謫貶南楚淪為客囚的不遇隱喻。故宋代以下學者不乏持近似見解者，例如

至於人棄不售，安知其後卒為名人賞踐，如滄浪亭者，今為韓蘄王家所有，價值數百萬矣；但鈇鋸潭後埋沒不可識。士之處世，遇與不遇，其亦如是哉。¹³

〈鈇鋸潭西小丘記〉「唐氏之棄地」，棄地此遷客。……「所以賀茲丘之遭也。」茲丘猶有遭逐客，所以羨而賀也。言表殊不自得也。¹⁴

從洪邁、何焯兩家的論評亦可見柳宗元文中之「唐氏棄地」，實由長安所指涉李唐君朝，並以「棄地」隱喻作者因謫放而背離京華之際遇。因此鈇鋸潭西小丘所以可賀，即因遭遇柳宗元等人而改變了多年見棄不售的既有命運。然而從另一方面而言，當作者從西小丘自我投射的謫囚身影中抽離出來，亦即改換原先人、丘合一的書寫觀照及其程式之後，不免延展並跌宕而為人不如丘之深沉慨歎。故柳宗元在這一長段文字中，自我與西小丘兩者的具體論述，實兼採「人、丘合一」與「人、丘分離」的二重性處理，從而形成遊記中作者與風景間若即若離的弔詭奇譎風格。由是觀之，他因憐惜西小丘而觸發「致之長安」的特殊情思，亦即文中所謂「以茲丘之勝，致之澧、鎬、鄆、杜。」¹⁵，則又屬他「人、丘合一」的觀照取向下，所映射柳宗元貶棄南楚坐困愁城，並希冀歸返的精神困境，從而企圖在虛擬長安的地理位移構思下，歷歷如繪的謫囚

¹² 以上三處引文，俱見〈鈇鋸潭西小丘記〉，《全唐文》（同註2），頁5870。

¹³ 參見宋·洪邁《容齋隨筆·三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卷90。

¹⁴ 參見清·何焯《義門讀書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卷36，頁505。

¹⁵ 參見〈鈇鋸潭西小丘記〉，《全唐文》（同註2），頁5871。

心靈圖景。這一極夢幻意味的心靈地圖拼湊，其實正可視為柳宗元永州夢魘刻骨銘心的精神世界，其中浮現而出的正是力圖掙脫束縛並超越禁錮的羈囚意識及其身影。而清人林雲銘之評述亦當由此體會：

此作把丘中之石，及既售得之後，色色寫的生活，尤為難得。末段已賀茲丘之遭，借題感慨，全說在自己身上。蓋子厚向以文名重京師，諸公要人，皆欲令出我門下，猶致茲丘於澧、鎬、鄂、杜之間也。今謫是州，為世大僂。庸夫皆得詆訶，頻年不調，亦何異為農夫、漁夫所陋，無以售於人乎。乃今茲丘有遭，而已獨無遭。賀丘所以自甲，亦猶起廢之答無雙足誕類之望也。嗚呼，英雄失路，至此亦不免氣短矣。讀者當於言外求之。¹⁶

也因此永州八記最後撰成的〈小石城山記〉，亦出現〈鈇錡潭西小丘記〉中將山水位移，並指涉長安不遇的類似書寫現象：

又怪其不為之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勞而無用。¹⁷

由此可見柳宗元之自我放逐於永州山水，固不免惆悵自甲，然其重返長安仕途之心，實未於此泯滅消解，甚至還不時閃現於山水遊記中，從而形成他羈囚困境中緬懷過往並放眼未來的精神焦慮。而林紓即洞鑒柳宗元此段文章之箇中消息並指稱：

其下「目謀」、「耳謀」、「神謀」、「心謀」四謀字。以外虛成內徹，似有見道之意。其下復冀及「貴游者之爭買」則名心到底不忘，仍與〈愚溪詩序〉同一口吻。¹⁸

此等托物而感遇。……未淨，終以遭遇為言。澧、鎬、鄂、杜，朝廷也；貴游之士，執政也；爭買者，置之門下也；言棄者，謫居也。¹⁹

¹⁶ 參見清·林紓《古文析義初編》(台北：廣文書局，1989)卷五。

¹⁷ 參見〈小石城山記〉，《全唐文》(同註2)，頁5872。

¹⁸ 參見清·林紓《韓柳文研究法》(台北：廣文書局，1980)下卷〈柳文研究法〉。

¹⁹ 清·林紓《古文辭類纂選本》，卷9。參見《唐宋八大家文鈔校注集評》(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頁1121。

林氏所謂「托物而感遇」具體而言，即指柳氏山水遊記中所寄寓的不遇之慨，於是作為士不遇指涉的長安情結，實為作者自我謫囚身分認同下，以山水書寫演繹心靈圖景的原始座標與關鍵樞紐，並從而形塑出藉遠離長安到山水出遊的身體行動與盼返長安的心靈取向間，身心錯位之苦楚與困境。從而見證此遊記與〈囚山賦〉旨趣之互為表裡，及其中謫臣與羈囚互涉的仕途焦慮意蘊。

（二）空間改造與鄉愁定位

柳宗元永州八記除藉由山水位移之構思與型態，進行其謫臣與羈囚雙重身分互涉的長安論述外；另一主要書寫型態，乃是透過具體的山水改造敘寫，展現作者心中所憧憬的長安場景，及其君臣遇合下永恆的仕宦夢想與政治藍圖，從而映射出柳宗元雖羈囚南楚，卻始終魂縈夢牽的明白長安圖景。換言之，從他撰於貶謫永州四年以後陸續撰寫的山水遊記而言，儘管他不乏山水宴遊之樂一類的情懷表述，例如：

洋洋乎與造物者遊，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游。²⁰
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²¹
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²²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珮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為坻為嶼，為嵒為巖。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游無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遊者相樂。²³
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蔭其上。古之人其有樂乎此耶？後之來者，有能追予之踐履耶？得意之日，與石渠同。²⁴

²⁰ 參見〈始得西山宴遊記〉，《全唐文》（同註2），頁5870。

²¹ 參見〈鈞錡潭記〉，《全唐文》（同註2），頁5870。

²² 參見〈鈞錡潭西小丘記〉，《全唐文》（同註2），頁5871。

²³ 參見〈至小丘西小石潭記〉，《全唐文》（同註2），頁5871。

²⁴ 參見〈石澗記〉，《全唐文》（同註2），頁5872。

然而柳宗元山水遊記的一大特色，即基本上在傳統因憂而遊的山水書寫旨趣上，延展並變創為曲折跌宕的「憂→遊→憂」的獨特山水觀照程式。因此在他筆下的永州山水，經常驀地愀然變色為或與長安接軌，或直接以長安虛擬，再現長安的具體書寫樣態。

身為長安謫臣，同時又兼具罪囚意識的柳宗元而言，一方面固然難以接受突如其來的逐臣夢魘，另一方面亦復懷抱重返長安的夢想。柳宗元的這一心境驗諸於其同撰於永州的〈夢歸賦〉即可略窺其豹。此賦開首即開宗明義地揭橥「罹擯斥兮以窘束兮，予惟夢之為歸。」的基本創作旨趣，而柳氏眷戀長安與故土的情愫，亦未嘗因寓囚永州而釋然消解，所謂：「精氣注以凝沍兮，循舊鄉而顧懷。夕予寐於荒陬兮，心慊慊而莫違。」²⁵此賦對於夢境之鋪陳敘寫，不乏屈原〈離騷〉中周流天界的近似身影，尤其歸旨於去國懷鄉的具體情志，亦不無屈騷篇末「忽臨睨乎舊鄉」的濃厚「故都」情結²⁶，但同中有異著乃在屈原惆悵中以「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自寬自解，但柳宗元賦篇中雖不無以老莊之道自勉，然卻不得不坦然面對自我戀戀京城，甚至魂縈夢繫的長安想望：

白日邈其中兮，陰霾披離以泮釋，施岳瀆以定位兮，互參差之白黑，忽崩騫上下兮，聊校行而自抑，指故都以委墜兮，瞰鄉閭之修直，原田蕪穢兮，崢嶸榛棘，喬木摧解兮，垣廬不飾，山嶠嶠以巖立兮，水汨汨以漂激，魂恍惘若有亡兮，涕汪洋以隕軾，類曠黃之駮莫兮，欲周流而無所極，紛若喜而怡凝兮，心回互以壅塞，鐘鼓惶以戒旦兮，陶去幽而開寤，會屬蒙其復體兮，孰云桎梏之不固，精誠之不可再兮，予無蹈夫歸路，偉仲尼之聖德兮，謂九夷之可居，惟道大而無所入兮，猶流遊乎曠野，老聃遁而適戎兮，指淳茫以縱步，蒙莊之恢怪兮，寓大鵬之遠去，苟遠適之若茲兮，胡為故國之為慕，首邱之仁類兮，斯君子之所譽，鳥獸之鳴號兮，有動心而曲顧，膠余衷之莫能捨兮，雖判折而不悟，列茲夢以三

²⁵ 參見柳宗元〈夢歸賦〉，《全唐文》（同註2），卷569，頁5757。

²⁶ 參見屈原撰離騷·宋洪興祖〈離騷〉，《楚辭補注》（台北：長安出版社，1991），頁47。

復兮，極明昏而告愬。²⁷

其中柳宗元既以「夢歸」作為抒解謫臣「罹擯斥兮以窘束兮」的一道情志出口，然則永州八記中所呈現的山水書寫，其實就應可視為另一精神出口，並且以其風景紛呈之樣態，一方面化身為謫臣情志的苦悶象徵，另一方面又從中獲得短暫的銷憂與樂遊。

柳宗元〈夢歸賦〉中魂夢進行的終極方向與目標，其實正是作為政治最高核心指涉的長安，亦即使他在精神上由謫臣身份進而黜貶為罪囚認知的具體根源，因此在〈夢歸賦〉裡柳宗元不禁發出「蒙其復體兮，孰云桎梏之不動，精誠之不可再兮，予無蹈夫歸路。」其中的羈囚意識對於視永州貶謫為嚴重精神與仕途挫折的柳宗元，無疑是另一層更為深沈巨大的精神貶謫。然則這一於屈〈騷〉中闇而未明的深層底蘊，到柳宗元辭賦中儼然成為作者揭竿高舉的重要創作旨趣。於是長安鄉愁堂而皇之成為柳宗元〈夢歸賦〉中情志世界的原點座標與定位取向，是故賦中一再出現之「施岳瀆以定位兮」、「云濟予乎西此」、「指故都以委墜兮」、「瞰鄉閭之修直」、「胡為故國之為慕」等等相關書寫，即為具體註腳。

長安故都始終是柳宗元貶謫時期精神座標的根本原點，其中映射他魂縈心繫的仕途舊夢及懷抱，於是在永州八記裡經常可以發覺柳氏藉山水隱喻長安的普遍性書寫特色。然則盛唐前賢李白〈夢遊天姥吟留別〉中已不乏運用此一筆法，即在「體物寫志」中以天姥山境隱喻長安朝廷²⁸，但柳宗元的特殊意義在於將之廣泛運用並集中映現於其山水遊記系列中，從而形成永州八記中山水書寫一大重要特質。其中即不乏山水景物之改造、整治來指涉長安朝廷，及其政治憧憬下的長安圖景的類似書寫。

柳宗元永州八記中攀登高山的相關書寫，除作為基本的自我指涉外，經常亦呈現以山川景觀之整理改造，作為作者登高望遠及其長安虛擬的創作取向。

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過

²⁷ (同註25)，頁5757。

²⁸ 參見安旗注李白〈夢遊天姥吟留別〉謂：「詩以天姥仙境喻朝廷宮闈，以夢遊喻其入侍翰林，宣洩失志去朝之情。」，《李白全集編年注釋》(成都：巴蜀書社，1990)，頁769。

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始得西山宴遊記〉

其高下之勢，岿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始得西山宴遊記〉

〈始得西山宴遊記〉藉「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的山林清理整治，乃得「攀援而登」西山，進而「窮山之高」、「箕踞而遨」，其中旨趣應首在超越困境。而就柳宗元兼具謫臣身分與羈囚意識的雙重認知而言，將超越困境精神理念具現為實踐行動的主要關鍵，即完全繫於千里之外的長安及其所指涉的大唐天子，於是深具家國意涵的京城長安，經常形同變裝的精怪魅影般，以各種不同姿態陰伏閃躲永州八記的山水世界中，於是所謂「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與「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皆一一化為柳宗元身在永州，卻心懷長安故都想望的文學註腳。其中實深刻映現他羈囚南楚，盼返長安的深層底蘊。因此永州山水亦經由作者巧妙地藝術改造，乃得超越原有的山川幽閉形勢及與視野困境，並一一與千里之遙的長安接軌，從而深刻映現出作者心繫長安的生命圖景。

永州八記之首的〈始得西山宴遊記〉既由上述山水的書寫取向，輝映其篇首所示「自余為僇人，居是州，恆惴慄。」的創作基調。其後柳宗元陸續撰寫的永州山水遊記中，仍不時再現這一書寫特質。例如〈鈇鋤潭記〉亦出現以改造山川景觀，作為故園情思與家國想望等多層書寫的內在隱喻：

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而墜之潭，有聲淅然。尤與中秋觀月為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迴。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²⁹

此文以高臺觀月為脈絡，既反映作者之思鄉情濃，更藉「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迴。」的故土興嘆中，委婉指涉對於長安京華及其冀仰天顏的謫臣深衷，從而延展出此文長安與君王互涉的另類鄉愁論述。換言之，〈鈇鋤潭記〉實深刻映照出柳宗元以山水論述鄉愁的基本創作旨趣³⁰，並從

²⁹ 參見柳宗元〈鈇鋤潭記〉，《全唐文》（同註2），頁5870。

³⁰ 羅聯添先生〈柳宗元二篇山水記分析〉指出：「這似乎隱含柳宗元思鄉之情。柳宗

中折射出柳宗元謫臣羈囚二者交疊的精神困境及其生命焦慮。

上述〈始得西山宴遊記〉、〈鈞錡潭記〉裡，作者常以山川景觀之清理改造，牽引作者的長安情思及其君臣想望，而其主要手法乃透過永州山水的重新改觀，並與長安遠景漸次接軌，展開具體的多重鄉愁論述。這一基本範式到〈鈞錡潭西小丘記〉亦不乏明顯的變創傾向，作者雖並未改變藉山川改觀論述長安的創作程式，但山川景觀的書寫定位，異於前兩文中銜接並貫串長安視界的中介載體，而代之以長安虛擬，甚至延展維朝廷圖卷的風華再現；換言之，於此文中，永州山水與長安朝廷，已非前文中若即若離的彼此狀態，而進一步以永州山水與長安朝廷交集，甚至疊合為一的變創性位移，重新建構長安在作者永州時期心靈世界中，更為濃郁而無法閃躲的長安想望。其中是否意謂著重返長安之情的日益迫切，以致於此文中的長安身影，已不再循前二文迂迴前進的書寫策略，卻代之以單刀直會的書寫模式，重現作者心中繫繫之長安圖景。以致柳宗元乃在篇末中有「以茲丘之勝，致之澧、鎬、鄂、杜。」之嘆，以小丘的長安想像反襯自我嚮慕長安卻不得重返的謫囚困境與羈囚夢幻。此外，如下所敘寫之空間改造：

李深源、元克己時同游，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剷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之遨遊，舉熙熙然迴巧獻技，以效茲丘之下。³¹

表面上的山川景觀改造，實即是柳宗元企冀重返長安的憧憬與藍圖，在此之下，山川改造就不僅可視為作者超越困境的一種精神隱喻，其中應更深層地寄寓造成柳宗元謫放永州的追憶與省思，亦即他追隨王叔文等人的政治變革一事，因此所謂「舉熙熙然迴巧獻技，以效茲丘之下」既是王、韋與柳宗元等人對於長安朝政氣象一新的理想政治藍圖，同時也是他希冀重返長安，實現君臣遇合，並殷盼賢進佞遠的未來憧憬與永恆圖景。此外如〈石澗記〉之山水書寫，則似乎更能凸顯柳宗元此一長安情結的進退維谷與憂樂不定的精神焦慮，例如文中敘寫石澗之浮想謂：

元貶謫永州後，時刻始他懷念的，是長安城西的故居，和城南的祖墳。」，《唐代四家詩文論集》，（同註3），頁282。

³¹ 參見柳宗元〈鈞錡潭西小丘記〉，《全唐文》（同註2），頁5870。

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一。巨石為底，達於兩涯。若床若堂，
若陳筵席，若限闔奧。³²

文中巨大底石，觸發作者「若床若堂」的聯翩浮想，然前者「若限闔奧」，而後者「若陳筵席」其間或憂或喜，二者情境迥然異趣，應視為柳氏謫囚永州亟思擺脫困境，並憧憬長安的心靈寫照及其精神焦慮。而以下一段，亦藉由山川景觀之改造整理，隱約映現作者預擬的長安前景與政治清明：

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操琴。揭跣而往，折竹箭，掃
陳葉，排腐木，可羅胡牀十八九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音，
皆在牀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蔭其上。古之人其有樂
乎此耶？³³

柳宗元以永州謫臣楚囚身分遊覽石澗，並觸動「胡牀十八九」之想，其中作者北方之思隱約可見，此與上述〈夢歸賦〉中「西北」、「故都」的周流「定位」相映成趣。胡牀本為北方胡族影響中原風格之具體而微，最早始於東漢洛陽，此風入唐更加蔚盛³⁴，而洛陽、長安即為大唐京都所在，因此柳氏文中的胡牀之思，除透露北方之思的箇中消息外，似應不無京華企慕之意；換言之，胡牀書寫不無寄寓作者重返京邑之思。而下文所謂「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牀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蔭其上。」正巧妙地藉山川木石之勢、聲，隱喻作者心中君臣上下，熙然成治的長安圖景。至於其中的龍鱗鳳羽應為至尊天子之指涉意涵，而柳宗元希冀重返長安，再度攀龍的謫臣楚囚焦慮實於此昭然若揭；至於「古之人其有樂乎此」，從傳統士人學而優則仕的儒家古訓而言，其中指涉應即是君臣遇合，共創賢明之治，從而體現道統與治統契合的士人理想樂園³⁵。

上述這一山水書寫面向，其中固然不無柳宗元追隨王、韋等人政治變革的初衷與理想的相關指涉，但同時更映現出他雖謫囚南楚，卻心繫長安，並企冀重返京邑的遐思與前景，從而具體而微地透露其山水書寫

³² 參見柳宗元〈石澗記〉，《全唐文》（同註2），頁5872。

³³ 參見柳宗元〈石澗記〉，（同註32），頁5872。

³⁴ 參見呂一飛《胡族習俗與隋唐風韻》（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4），頁88。

³⁵ 參見余英時〈道統與治統之間〉，《士與中國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頁84-112。

背後的深層焦慮取向。

(三) 山水傳播與仕途想望

柳宗元山水遊記之所以能於風景中投射情志，主要亦得力於前人所謂「虛摹筆」者，故章士釗即曾論及柳文此一特殊筆法謂：

所謂虛摹筆者，是模稜兩可語，如本篇之「觸激之音，皆在牀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蔭其上。古之人其有樂乎此耶？」此實寫乎？抑虛摹乎。吳摯父於此評云：「襟抱偶然一露，是謂神到。」既謂神到，非虛摹無由得神，然則子厚諸記中所設詞，皆作虛摹論，殆無不可。³⁶

柳氏遊記既藉山水書寫虛摹並透露其胸中襟抱，其中主要當即以長安指涉的京邑、故園等家國意涵。因此柳氏永州八記除經常藉由山川木石之改觀，作為虛摹指涉的具體途徑外，有時亦強調開發改造之後的山水景觀之有待宣揚傳播，庶幾在參贊天地化育的人為功夫下，讓永州山川木石的原有蘊涵風華再現；換言之，的柳宗元，不免殷盼有朝一日，在煥然一新的氣象裡，改頭換面，重見天日，從而擺脫當下謫宦楚囚的仕途困境。這不僅是柳宗元山水遊記中一貫擅長的虛摹筆法，更契合從〈始得西山宴遊記〉到〈囚山賦〉中此起彼落的自我「僇人」意識及其羈囚指涉。故永州山水之美需遭逢柳宗元等人，方能不棄如敝屣；反之，永州八記中的山川木石之美，還更待有心人士，揄揚宣美，方能物盡其用，共成兼濟天下之美；否則徒然囿於獨善一、二知音，畢竟是胸懷天下者的一大缺憾。因此山川木石不僅有待改造重整，更亟需傳揚遠近，惠及四海。此所以柳宗元以永州山川木石之可喜可賀，然則對照柳宗元本人之不幸，正由於謫囚永州，且未逢貴人將其美才賢能上達聖聽，從而讓君王回轉心意，召回長安，重見天日，以超越當下困境，並進而實現其兼濟天下，澤及蒼生的士人終極懷抱。因此永州八記中的一再展現的山水傳播意向，除了間接也反映出唐朝發達蓬勃的傳播文化外³⁷，更凸顯柳宗元藉山水虛摹人生的特殊文學筆法。例如〈鈿姆潭西小丘記〉文末

³⁶ 參見章士釗《柳文指要》（上海：文匯出版社，2000），頁670。

³⁷ 參見李彬《唐代文明與新聞傳播》（北京：新華出版社，1999），頁11-19。

一段外，³⁸又如：

永之人未嘗游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世。其地主袁氏，故以名焉。〈袁家渴記〉³⁹

其側皆詭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席焉。風搖其巔，韻動崖谷。視之既靜，其聽始遠。予從州牧得之，攬去翳朽，決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醜而盈。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書之其陽，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
〈石渠記〉⁴⁰

然則柳宗元這一亟待重返長安，擺脫謫囚困境以重見天日的仕途夢想，在客觀上確實有待長安朝廷「好事」的貴人伸出援手，然而徵諸他撰於永州第十年的〈囚山賦〉來看，這樣的「好事」之夢，顯然始終未曾實現，故賦末不禁感慨地說：

予胡井晉以管視兮，窮坎險其焉逃，顧幽昧之罪加兮，雖聖猶病夫嗷嗷，匪兇吾為桎兮，匪豕吾為牢，積十年莫吾省者兮，增蔽吾以蓬蒿，聖日以理兮，賢日以進，誰使吾山之囚吾兮滔滔。⁴¹

由此可見，這又是柳宗元永州山水書寫中，進一步由山川傳播的具體書寫型態，映照長期謫囚永州的「不幸」。而其精神的苦悶，又在缺乏朝中「好事」貴人，為之辯解並洗刷罪辱，如此利安元元的宿志不僅無解，而且只得永作南楚縲囚，無緣重返長安。⁴²

四、幽黯國度：永州八記與〈囚山賦〉中的異化書寫及其山水煉獄

永州八記的山容水態中，普遍的展現出柳宗元虛摹長安及其士人襟抱的焦慮實質，而其重要根源之一，又關涉著深烙他心靈底層又始終難以逃脫的謫囚陰霾，況且這一場突如其來，不及閃避的宦海風暴，對於

³⁸ 參見柳宗元〈鈿鉤潭西小丘記〉，(同註2)，頁5870。

³⁹ 參見柳宗元〈袁家渴記〉，頁5871。

⁴⁰ 參見柳宗元〈石渠記〉，(同註2)，頁5872。

⁴¹ 參見柳宗元〈囚山賦〉，(同註2)，頁5757-5758。

⁴² 參見柳宗元〈答問〉：「吾縲囚也。逃山林入江海無路，其何以容吾軀乎？」，《全唐文》(同註2)，頁5920。

向來以利安元元為生命職志的柳宗元而言，謫囚永州不啻是他仕途生涯藍圖中的一個異數、一種異化，甚至是人生舞台上出乎意外的變調劇本。同時，由於永州的客觀地理因素與環境條件，進一步衍生的病疾纏身、親人變故、行動限制等等人生圖景的急遽扭曲與巨變⁴³，共同交織而成柳宗元永州謫囚的夢魘與焦慮。因此身心俱疲的永州謫囚生涯裡，山水出遊固然可以作為柳宗元苦中作樂的暫時調劑與解脫，但掩抑於內心深層的謫囚意識，卻又同時在山涯水畔的景態裡，不經意地一一被牽引召喚，甚至呈現噴薄而出的激情風貌，從而在山水風景與謫囚焦慮的互涉交融之下，延展而出永州八記另一層山水書寫意涵：幽黯國度。

柳宗元永州山水書寫中最能明顯展現其「厭山」意識的是〈囚山賦〉。此賦對於南楚山水的創作取向，完全定焦於其陰幽濕熱，處處險惡的囚獄特質。例如：

楚越之交環萬山兮，勢騰涌夫其波濤，紛對迴何仰伏以離遯兮，若重壟之相覆，爭生角逐上軼旁出兮，其下坼裂而為壕，欣下頽以就順兮，曾不畝平而又高，沓雲雨而漬厚土兮，蒸鬱勃其腥臊，陽不舒以擁隔兮，群陰沍而為曹，側耕危穫苟以食兮，哀斯民之增勞，積林麓以為叢棘兮，虎豹咆*闕代狴牢之吠嗥，予胡井晉以管視兮，窮坎險其焉逃。⁴⁴

永州山水既處處易令人有囚獄之想，一如他在〈與李翰林建書〉所說：「永州於楚為最南，狀與越相類，僕悶及出游，游復多，恐涉野則有蝮虺大蜂，仰空視地，寸步勞倦，近水即畏射工沙蟲，舍怒竊發，中人形影，動成瘡痍。」⁴⁵可見永州客觀的地理風物特徵，對於貶謫永州已然四年的柳宗元仍然深以為苦，相對於京都長安等中原記憶而言，不啻天壤之殊；換言之，「異化」的永州山水，確實構成柳宗元對於永州山水觀照的基本認知，然則〈始得西山宴遊記〉所謂：「凡是州之山水有異態者，皆我有也。」已透露箇中消息。

居蠻夷中久，慣習炎毒，昏眊重飑，意以為常，忽遇北風晨起，薄寒中體，則肌革慘慄，毛髮蕭條，瞿然注視，怵惕以

⁴³ 參見孫昌武《柳宗元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頁86-94。

⁴⁴ 參見柳宗元〈囚山賦〉，（同註2），頁5757。

⁴⁵ 參見柳宗元〈與李翰林建書〉（同註2），頁5794。

為異候，意緒殆非中國人。⁴⁶

上述永州敘寫中所流露的「異化」特質，反映出深具謫囚意識的柳宗元面對南楚地理山川產生陌生與不安的焦慮表徵，從而在客觀條件與主觀精神的交錯之下，浮現出柳宗元永州山水敘寫背後，深富囚禁意涵的幽黯國度。

(一) 山川奇詭與幽黯國度

柳宗元謫放永州無疑是前進仕途的一次重大失足，並從此深陷於自我定位的精神囚獄當中。因此即使永州不乏西山、鈇姆潭、袁家渴、石丘、石澗等等山川勝景，並一一匯寫而成他筆下的永州八記，然而浮現在繽紛複沓之山姿水容背後的謫囚陰霾，畢竟還是柳宗元永州山水的觀照基調。因此具現於其山水遊記中的風景書寫，亦經常呈現山川怪異、崎嶇、詭譎等等特徵，並從而形構以山水異態隱喻幽黯國度的敘寫特色。例如：

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其高下之勢，呀然洼然，若垤若穴。

〈始得西山宴遊記〉⁴⁷

抵山石，屈折東流，其顛委勢峻，盪擊益暴，齧其涯，故旁廣而中深。〈鈇姆潭記〉⁴⁸

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為奇狀者，殆不可數。其巖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於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於山。〈鈇姆潭西小丘記〉⁴⁹

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至小丘西小石潭記〉⁵⁰

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間廁曲折，平者深墨，峻者沸白。

〈袁家渴記〉⁵¹

又折西行，旁陷巖石下，北墮小潭。...其側皆詭石怪木，奇

⁴⁶ 參見柳宗元〈與蕭翰林俛書〉(同註2)，頁5793。

⁴⁷ (同註2)，頁5870。

⁴⁸ (同註2)，頁5870。

⁴⁹ (同註2)，頁5870。

⁵⁰ (同註2)，頁5871。

⁵¹ (同註2)，頁5871。

卉美箭，可列坐而床焉。〈石渠記〉⁵²

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險，道狹不可窮也。〈石澗記〉⁵³

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

其上為睥睨梁欂之形，其旁出堡塢，有若門焉。窺之正黑。

〈小石城山記〉⁵⁴

這些形勢曲折，極盡詭怪之山川景觀，散列於永州八記的字裡行間，固然源自客觀的先天特質，然而卻一一化身為柳宗元仕途曲折，謫囚永州，並陷入精神世界之幽黯國度的指涉話語。並且在上述相關敘寫中，幽黯深黑亦成為其間的主要風景色調，從而映射出柳宗元永州八記藉山水異態指涉幽黯國度的書寫特色。

（二）山水變色與幽黯國度

永州八記的另一特殊敘寫型態，則是山川風景的驟然變色，從而揭示作者以幽黯國度觀照永州山水的謫囚焦慮。於此之下，永州八記中大篇幅良辰美景與賞心悅目的書寫內容，其實正如〈與李翰林建書〉所說：「時到幽樹好石，暫得一笑，已復不樂，何者，譬如囚拘圜土，一遇和景，負牆搔摩，伸展肢體，當此之時，亦以為適。」⁵⁵只是片刻的苦中作樂，雖能成就瞬間的虛幻之美，然而究非柳宗元謫囚永州的心靈底蘊，因此他於〈與李翰林建書〉更緊接申明：「然顧地窺天，不過尋丈，終不得出，豈復能久為舒暢哉」⁵⁶因此藉由這一謫囚心跡的自我告白，對照永州八記中一再出現的山川變色敘寫，不難浮現出柳宗元藉此隱喻幽黯國度的重要書寫旨趣，及其映照於風景背後的謫囚焦慮。例如：

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游無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佶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遊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淒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

⁵² (同註2)，頁5872。

⁵³ (同註2)，頁5872。

⁵⁴ (同註2)，頁5872。

⁵⁵ 參見柳宗元〈與李翰林建書〉，(同註2)，頁5795。

⁵⁶ 同上註，頁5795。

記之而去。〈至小丘西小石潭記〉⁵⁷

其下多白礫，其樹多楓柝石楠、榿櫨樟柚，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而蔓生，繆羈水石。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苒眾草，紛紅駭綠，蕤勃香氣，衝濤旋瀨，退貯谿谷，搖颺葳蕤，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袁家渴記〉⁵⁸

古之人其有樂乎此耶？後之來者，有能追予之踐履耶？得意之日，與石渠同。由渴而來者，先石渠，後石澗；由百家澗上而來者，先石澗，後石渠。澗之渴窮者，皆出石城村東南，其間可樂者數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險，道狹不可窮也。

〈石澗記〉⁵⁹

永州八記風景書寫中呈現的這一敘寫情調，應可間接印證柳宗元〈始得西山宴遊記〉開宗明義的「僇人」意識及其「惴慄」不安的精神焦慮特質。其中山川風景的愀然變色與遊移不定的書寫取向，適足以映照謫囚的特殊心境。

（三）桃源偶瞥與幽黯國度

柳宗元山水遊記中所隱喻的幽黯國度，有時亦具現為桃源身影的相關虛擬，驚鴻一瞥地閃現永州山水的夢幻國度中，進而又以夢醒時分的眼光，清晰地對照出桃源虛摹的稍縱即逝，及其在實際世界的虛妄與幻滅，作為其山水遊記中幽黯國度論述的另一特色。這一書寫特徵，尤以〈袁家渴記〉最為顯著：

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間廁曲折，平者深墨，峻者沸白。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上生青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其樹多楓柝石楠、榿櫨樟柚，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而蔓生，繆羈水石。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苒眾草，紛紅駭綠，蕤勃香氣，衝濤旋瀨，退貯谿谷，搖颺葳蕤，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余無以窮其狀。永之人未嘗游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

⁵⁷ 參見〈至小丘西小石潭記〉，(同註2)，頁5871。

⁵⁸ (同註2)，頁5871。

⁵⁹ (同註2)，頁5872。

而傳於世。〈袁家渴記〉⁶⁰

其中敘寫柳宗元邂逅袁家渴幽麗天地的過程與情景，特別渲染「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情景，儼然重現陶潛筆下的桃花源身影，而於永州八記中，這一與世無爭，和諧自得的桃源情境與生命情調，其實亦廣泛流露在柳宗元永州山水遊記裡，例如〈鈇鋸潭西小丘記〉中「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以下一段所鋪陳天地「熙熙然」境界；〈至西小丘西小石潭記〉寫石潭魚遊之樂「怡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遊者相樂。」；〈小石城山記〉之「其旁出堡塢，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等等皆令人有羲皇古韻之想。永州八記中柳氏遊蹤所至所樂的「幽麗」山水，顯然不乏陶氏桃花源的情境特質，而柳宗元本亦唐代陶潛風範的慕者之一，他的詩亦不乏效陶之作，例如他同作於永州時期的〈飲酒〉、〈田家三首〉：

今旦少愉樂，起坐開清樽。舉觴酌先酒，為我驅憂煩。須臾心自殊，頓覺天地暄。連山變幽晦，淥水函晏溫。藹藹南郭門，樹木一何繁。清陰可自庇，竟夕聞佳言。盡醉無復辭，偃臥有芳蓀。彼哉晉楚富，此道未必存。〈飲酒〉

古道饒蒺藜，縈迴古城曲。蓼花被堤岸，陂水寒更淥。是時收穫竟，落日多樵牧。風高榆柳疏，雙重梨棗熟。行人迷去住，野鳥競棲宿。田翁笑相念，昏黑慎原陸。今年幸少豐，無厭饘與粥。〈田家三首·其三〉⁶¹

其中〈田家〉詩之旨趣固然未必盡同於陶潛意境⁶²，但清代詩論家大多見出詩中的陶潛身影，例如周明輔、孫月峰、蔣之翹、汪森韓、賀貽孫等等⁶³。其中賀貽孫更點出柳氏山水詩與永州八記中令人有陶潛桃源之想：

其山水詩，類其鈇鋸潭諸記，雖篇幅不廣而意境已足，如武

⁶⁰ 參見〈袁家渴記〉，(同註2)，頁5871。

⁶¹ 上引詩參見柳宗元撰，王國安箋釋《柳宗元詩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頁244、245。

⁶² 如章士釗《柳文指要》以為柳詩另有代農者宣洩之意。(同註37)，卷1，頁1045。

⁶³ 同上註，頁246。

陵一隙自有日月，與蘇州詩未易優劣。唯〈田家〉詩，直與儲光羲爭席，果勝蘇州一籌耳。⁶⁴

可見柳宗元的作品確不乏擬效陶淵明的一面，而且這類作品大都撰於謫貶永州之後，故前人詩話中即不乏認為柳詩「置於淵明集中，不復可辨」⁶⁵，可見陶潛風範在柳宗元謫居永州的詩文創作世界中具有重要的影響與意義。然則賀貽孫的說法終就融而未明，實際上柳宗元永州八記中即不乏陶氏筆下的桃源蹤影及其生命情調。甚至於其中普遍展現的山水之樂，或深或淺皆閃現著此一特質。甚至前述永州八記中一再出現山水傳播的相關敘寫，應即可視為陶潛〈桃花源記〉所謂「此中人語云：不足與外人道。」的變創改寫。換言之，柳宗元的永州八記，實巧妙融鑄陶潛及其桃源的相關意象，並且一面援引書寫，同時進行改寫，而且變創地展現為對陶氏筆下桃花源的不同觀照取向。就世俗眼光而言，桃花源乃是不復可得的偶然邂逅⁶⁶；但就陶潛本身而言，應是具有以瞬間為永恆的理想藍圖意涵，從而流露一種永不放棄的士人襟懷。然而永州八記裡驚鴻一瞥的桃源虛摹，就只能是瞬間乍現的泡沫與幻影。兩者之間的分際，應在桃花源對於陶潛是一種永恆的追夢之旅；但面對謫囚意識深烙的柳宗元而言，固然亦可視為稍縱即逝的陶醉自得，卻不免淪為惘然深陷精神幽黯國度的詭變序幕。因此偶見於永州八記中的桃源蹤影，只能是柳宗元情志世界裡的匆匆過客，卻始終難以成為他終極與永恆的生命歸宿。是故永州八記的桃源虛摹，不免要在柳宗元現實人生的黜陟跌宕中，成為一種失落與缺憾的生命隱喻。

五、木石鏡像：永州八記與〈懲咎賦〉、〈閔生賦〉、〈解崇賦〉中的物我觀照及其歸返焦慮

柳宗元永州八記裡牢籠百態與紛呈羅列的山川景物敘寫，並非停留在表層的陶然沉醉，即如前文所述，柳氏筆下的山容水態其實深富情志

⁶⁴ 參見清·賀貽孫《詩筏》，（同註 62），頁 246。

⁶⁵ 參見宋·曾季狸《艇齋詩話》評柳宗元〈覺衰〉、〈讀書〉二詩，《宋詩話全編》（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頁 2623。

⁶⁶ 陶潛〈桃花源記〉謂：「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志，遂迷，不復得路。……欣然規往，未果。……後遂無問津者。」，《陶淵明集》（長沙：岳麓書社，1996），頁 100。

虛摹的豐富面向。於是山水景物化身為其囚獄天地偶然邂逅並驚艷的一道陽光外；有時也巧妙地映現為幽黯國度與桃源乍現的二元互涉。換言之，他們既可一方面成為柳宗元謫囚永州的精神示現，卻又經常化身為超越困境，召喚出路的生命光譜。對於作者而言，永州八記的山水敘寫，既折射出他預擬的生命春光，卻也清晰地見證謫囚眼前的酷冬嚴寒。因此除了山川丘潭之外，一樹一石也煥然紛呈為其情志世界的具體隱喻，然則視永州如囚獄的謫臣柳宗元而言，對於這一趟宦海仕途的沉浮崎嶇，不免回首省思，一如閉門思過的囚徒，在撫今追昔的省思中，百味紛陳；至於其中的悔恨交加或者執著不悔，亦一一成為柳宗元永州八記中物我觀照的另一重要意蘊。

（一）木石修蹇與仕途懲咎

柳宗元〈始得西山宴遊記〉既指「幽泉怪石」等西山「異態」奇觀為「皆我有也」，實不無以怪特水石「虛摹」隱喻自我之意。因此出現於〈鉅鉤潭西小丘記〉中的「唐氏之棄地」，顯然亦以謫臣自喻，而其敘寫山石一段：「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為奇狀者，殆不可數」，並有所謂「其嶽然相累而下者」、「其衝然角列者」應可視為其被謫永州之前，年少志遠，意氣風發，並追隨王叔文等人永貞革新的仕途追憶與自我凝視，正如他在〈與蕭翰林佖書〉所追述的這段心路歷程：

然僕當時年三十三，甚少，自御史裡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媚嫉，其可得乎，凡人皆欲自達，僕先得顯處，才不能踰同列，聲不能壓當世，世自怒僕宜也，與罪人交十年，官又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宏大，貶黜甚薄，不能塞眾人之怒，謗語轉侈，囂囂嗷嗷，漸成怪民，飾智求仕者，更置僕以悅讎人之心，日為新奇，務相喜可，自以速援引之路，而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橫生不知其端，伏自思念過大恩甚乃以致此。⁶⁷

兩者對照之下，可見鉅鉤潭西小丘之精神實具現於難以自掩的修蹇「顯美」與鋒芒太露，即所謂「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為奇狀者」而西小丘以此論為「唐氏之棄地」，不亦與柳宗元〈與蕭翰林佖書〉中

⁶⁷ 參見柳宗元〈與蕭翰林佖書〉，（同註2），頁5793-5794。

所指自身因「超取顯美」，而「坐益困辱」，謫貶永州之際遇，如出一轍。於是遍布於永州八記的水清石奇相關書寫，如〈鈇鋸潭記〉、〈鈇鋸潭西小丘記〉、〈至小丘西小石潭記〉、〈袁家渴記〉、〈石渠記〉、〈石澗記〉、〈小石城山記〉等皆無例外。此一書寫特色，應可視為柳宗元以水石指涉其初入仕途，平步青雲，卻招致物議，以致謫放的仕途慨歎與自我審視。

柳宗元以石自喻自省，並感慨系之，其中實不無自悼之意，尤其謫放永州一事，對他而言，既以「僇人」自視，亦為仕途進退的具體關鍵，更是含冤莫辯清白難訴的緣由，因此其介如石，其清如水正映射出他謫囚南楚，回首長安的士人告白。而且此一心跡，也可徵諸他撰於永州的〈懲咎賦〉。例如：

哀吾生之孔艱兮，循凱風之悲詩，罪通天而降酷兮，不殛死而生為，逾再歲之寒暑兮，猶冒冒然而自持，將沉淵而殞命兮，詎避罪以塞禍，惟滅身而無後兮，顧前志猶未可，進路呀以劃絕兮，退伏匿又不果，為孤囚以終世兮，長拘攣而轉軻，曩予志之修蹇兮，今何為此戾也，夫豈貪名而盜名兮，不混同於世也，將顯身以直遂兮，眾之所宜蔽也，不擇言以危肆兮，固群禍之際也，御長轅之無撓兮，行九折之峨峨，卻驚棹以橫江兮，泝凌天之騰波，幸余死之已緩兮，完形軀之既多，苟餘齒之有懲兮，蹈前烈而不頗，死蠻夷固吾所兮，雖顯寵其焉加，配大中以為偶兮，諒天命之謂何。⁶⁸

換言之，〈懲咎賦〉固然深具謫囚閉門思過的重要意涵，然而卻並不等於是一場由長安謫放永州的「悔志」告白⁶⁹。實際上，他深責自咎的正是其介如石，其直如木的「年少好事」與「以愚致罪」，而且是個以淡泊、清白「利澤廣大」自許的美士與愚者⁷⁰，亦始終並未對以政治革新為理想的士人襟懷與宿志有所懊悔。因此以利安元元上契聖人大中之道的士人信念，反倒是以木石自喻的柳宗元，一以貫之的永恆堅持。

⁶⁸ 參見柳宗元〈懲咎賦〉，(同註2)，頁5756。

⁶⁹ 參見何淑貞〈柳宗元懲咎賦非悔志解〉，《高雄師大學報》(高雄：高師大國文系，1990)，第1期，頁25-33。

⁷⁰ 參見方介〈柳宗元的愚者形象〉，氏撰《韓柳新論》(台北：學生書局，1999)，頁245-246。

(二) 南楚多石與君王怨望

其次，永州八記中最能集中映現柳氏此一傳統士人風骨的〈小石城山記〉，文中所以有南楚「少人而多石」之歎，其中乃深寓柳宗元自視介直如木石者，不僅難以見容於宦海風波澎湃洶湧的中原長安，而且終將遭逢南貶的謫囚下場。其中自有作者身歷朝廷的謫貶觀照，亦有對當時朝中同僚友好，同遭謫放的感慨⁷¹，甚至延展而出的是對君王未能近賢遠佞，乃至棄之不顧的謫臣怨望：

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為誠有。又怪其不為之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為偉人，而獨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⁷²

柳宗元藉小石城之拘囚「更千年不得一售其伎」，指涉自身被謫永州多年，未見赦還長安以一展所長的士不遇意涵。顯然文中主宰宇宙天地的「造物者」，正是主宰他一生仕宦命運的長安君王。其中值得玩味的是，在柳氏筆下此一造物者出現從存有到虛無的疑慮，其中實不無對於理想與當代君王間落差的嗟嘆，並具體而微地透露其君王怨望的箇中消息。因此柳宗元接著運用虛擬的「或曰」之說，映射其內心疑惑不安的謫囚焦慮。其一說謂「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若永州幽麗山水徒然為提供像柳宗元一般際遇的「賢而辱於此者」而存在，則柳宗元之果真能藉此而消解其謫囚之苦？再者，若誠可稍慰謫囚一時之臣，何以謫囚多年不見詔還京邑；至於另一說乃「其氣之靈，不為偉人，而獨為是物」。若果如是，則南楚乃天靈物奇，唯獨無人傑？就柳宗元而言，亦難以自釋自解。換言之，兩種虛擬之說，其實乃柳宗元借問答之設，展現其內心之掙扎與疑慮，是故南楚之「少人而多石」，一方面映射出柳氏對於長安君王不知重視南貶謫臣，甚而棄如敝屣的自我焦慮；另一方面亦復在介直如石的自我審視中企圖覓尋永州迷惑的終極解答。而久貶永州未能再睹天顏，重見天日的謫囚焦慮，亦反映在柳宗元的辭賦

⁷¹ 參見尚永亮《科舉之路與宦海浮沉》，（台北：文津出版社，2000），頁179-240。

⁷² 參見柳宗元〈小石城山記〉，（同註2），頁5872。

與書信中。例如〈囚山賦〉所謂「誰使吾山之囚吾兮滔滔」⁷³，其中久困永州所牽動的絕望情思躍然紙上。而所謂聖賢之說，其實即為柳宗元面對君臣不遇的深沉喟嘆，而「積十年莫我省者兮」，更直接指涉長安君王之漠然棄置。故其謫囚見棄之感，日益加深，誠如〈閔生賦〉等篇所述：

顧余質愚而齒滅兮，宜觸禍以玷身，知徙善而革非兮，又何懼乎今之人，噫禹績之勤備兮，曾莫理夫茲川，殷周之廓大兮，南不盡夫衡山，余囚楚越之交極兮，遊離絕乎中原，壤汗潦以墳洳兮，蒸沸熱而恒昏，戲鳧鷖乎庭中兮，葦葭生於堂筵，雄鷗蓄形於木杪兮，短狐伺景於深淵，仰矜危而俯傑兮，弭日夜之拳攀，慮吾生之莫保兮，忝代德之元醇，孰眇軀之改愛兮，竊有繼乎古先，明神之不欺余兮，庶激烈而有聞，冀後害之無辱兮，匪徒蓋乎曩愆。⁷⁴

今汝之託也，遠王都三千里。……唯觸罪竇辱愚陋黜伏者，日侵侵以遊汝，……汝欲為智乎，胡不呼今之聰明皎厲握天子有司之柄以生育天下者，使一經於汝，而唯我獨處。⁷⁵

柳宗元長期謫囚永州，既在不同撰述中或顯或隱地表述謫囚永州之原委，與清白耿直的自我審視，而又庶幾能藉助同僚友好之陳情，上達天聽，企冀有朝一日重返長安，共創君臣遇合的賢能之治。然則晷晷代，杳無訊息，柳宗元一面雖不無躬省自責之意，但隨著時間所引發惆悵不安的信心焦慮，亦終難盡掩君王怨望之情。而且這一長年累積的情愫，終延展為〈小石城山記〉篇末所謂南楚「少人而多石」的慨歎。但就謫囚永州的柳宗元而言，並未完全放棄一絲一毫重見天日，再返長安的最終希望。於是他深加掩抑，沉默自持，然則不可諱言地對於仍一心繫念長安的柳宗元，畢竟陷入煎熬與折磨，也是別無取擇的唯一選項。此一欲言又止的情志波瀾，畢竟難以無動於衷，因此〈小石城山記〉篇末雖終對「慰夫賢而辱於此者」與「其氣之靈，不為偉人，而獨為是物」二者，乃南楚「少人而多石」緣由之見並不採信，然其掩抑於深層的謫囚

⁷³ 參見柳宗元〈囚山賦〉，(同註2)，頁5757。

⁷⁴ 參見柳宗元〈閔生賦〉，(同註2)，頁5756。

⁷⁵ 參見柳宗元〈愚溪對〉，(同註2)，頁5906。

焦慮，終究隱約可見。

(三) 木石自處與愚者緘默

對於謫囚永州並未悔志自咎的柳宗元而言，其中不乏清白冤枉之想。因此水清石介誠為謫囚的心情告白。但對於謫囚永州而言，畢竟事出有因，柳宗元的回首自省，實只承認並歸罪於自我的愚直性情，以致不能洞微機先，謹言慎行，而他亦常以此自嘲自解，例如撰於永州的〈愚溪詩序〉、〈愚溪對〉皆為柳氏以愚者自居自解的具體例證，其中固然隱寓著初始掙扎之痛楚，但他終有定見的堅持所謂⁷⁶：

君子之道，處焉則外愚而內益智，外訥而內益辯，外柔而內益剛。出焉額則外內若一，而時動以取其宜當，而生人之性得以安，聖人之道得以光，獲是而中，雖不至苟老，其道壽矣。……宗元始者講道不篤，以蒙世顯利，動獲大僂，用是奔竄禁錮，為世之所詬病。……然苟守先聖之道，由大中以出，雖萬受曠棄，不更乎具內，大都類往時京城西與丈人言者，愚不能改，……仕雖未達，無忘人生之患，則聖人之道幸甚。⁷⁷

由此書信亦可見以愚觸罪，才是柳宗元自省謫放永州的主要理由，亦所以藉以自清的具體關鍵。因此永州八記中幽泉清潭之清澈澄明，其實又不時映現出他的清白自居，同時為緩和源自朝廷京城此起彼落的謗言妄災，並庶幾重見天日，回返長安，以愚者自居誠屬柳宗元的明智之論，因此沉默是金便成為謫囚永州的最佳自處之道。於是選擇以木石自許，並始終保持緘默，誠如〈與蕭翰林俛書〉中的自述。此外，尤為重要關鍵者，則為柳氏〈解崇賦〉所揭示攸關口舌之禍與長安謗言的自惕意識：

讀周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往復益喜曰，嗟乎余家雖置一喙以自稱道，詬異甚耳，用是更樂瘖默，思與木石為徒，不復致意。〈與蕭翰林俛書〉⁷⁸

柳子既謫，猶懼不勝其口，筮以元遇干之八，其贊曰，赤舌

⁷⁶ 關於柳宗元之愚者觀請參見方介〈柳宗元的愚者形象〉，(同註71)，頁233-242。

⁷⁷ 參見柳宗元〈答周君巢餽藥久壽書〉，(同註2)，卷574，頁5805。

⁷⁸ 參見柳宗元〈與蕭翰林俛書〉，(同註2)，頁5794。

燒城，吐水於瓶，其測曰，君子解崇也，喜而為之賦。胡赫炎薰熇之烈火兮，而生夫人之齒牙，上殫飛而莫遁，旁窮走而逾加，九泉焦枯而四海滲涸，紛揮霍而要遮，風雷唬唬以為囊籥兮，回祿煽怒而喊呀，炖堪輿為甌嶽兮，熬雲漢而成霞，鄧林大椿不足以充於燎兮，倒扶桑落棠膠輻而相叉，膏搖唇而增熾兮，焰掉舌而彌葩，沃無瓶兮撲無簪，金流玉鑠兮曾不自比於塵沙，獨淒已而煥物，愈騰沸而駭訶，吾懼夫灼爛灰滅之為禍，往搜乎太元之奧，訟眾正，訴群邪，曰，去爾中躁與外撓，姑務清為室而靜為家，苟能是，則始也汝邈，今也汝遐，涼汝者進，烈汝者賒，譬之猶豁天淵而覆原燎，夫何長喙之紛拏，今汝不知清已之慮而惡人之譁，知靜之為勝而動焉是嘉，徒遑遑乎狂奔而西慄，盛氣而長嗟，不亦燎乎，於是釋然自得，以冷風濯熱，以清源滌瑕，履仁之實，去盜之兮，冠太清之元冕，佩至道之瑤華，鋪沖虛以為席，駕恬泊以為車，瀏乎以遊萬物者，始彼狙雌倏施而以崇為利者，夫何為耶。〈解崇賦〉⁷⁹

柳宗元以木石指涉亟欲瘖默無言的自處之道，應即是他期待早日解脫永州謫囚的儂人省思。然其中所謂「木石」書寫，應受前賢鮑照〈擬行路難〉的啟發，按鮑照〈擬行路難十八首〉有「心非木石豈無感，吞聲躑躅不敢言」⁸⁰而柳宗元之保持緘默，實如鮑照所謂果豈無感，只是忍辱不言。這一心態若對照前述柳宗元謫囚永州後長安謗言的落井下石處境，就更能深諳箇中消息；更何況以木石自許的柳宗元之所以謫囚永州，亦頗緣於愚直如木石之性情使然，這不亦與鮑照〈擬行路難〉所述：「自古聖賢盡貧賤，何況我輩孤且直」⁸¹的慨歎古今契合；其次，從柳宗元復有〈行路難三首〉之作，亦可略知其頗受鮑照牽動的創作背景。例如：

君不見，夸父逐日窺虞淵，跳踉北海超崑崙。披霄決漢出沆漭，瞥裂左右遺星辰。須臾力勁道渴死，狐鼠蜂蟻爭噬吞。

⁷⁹ 參見柳宗元〈解崇賦〉，(同註2)，頁5755。

⁸⁰ 參見鮑照撰，葉菊生校訂《鮑參軍詩註》(台北：華正書局，1973)，卷2，頁56。

⁸¹ 同上註，頁57。

北方婦人長九寸，開口抵掌更笑喧。啾啾飲食滴與粒，生死亦足終天年。睢盱大志小成遂，坐使兒女相悲憐。〈其一〉
 虞衡斤斧羅千山，工命採斫代與椽。深林土剪十取一，百牛連鞅摧雙轅。萬圍千尋妨道路，東西蹶倒山火焚。遺餘毫末不見保，躡躑澗壑何當存？群材未成質已夭，突兀孝豁空巖巒。柏梁天災武庫火，匠石狼顧相愁冤。君不見，南山棟梁益稀少，愛材養育誰復論。〈其二〉⁸²

這組詩為柳宗元貶於永州後所作，〈其一〉乃運用《山海經》中夸父逐日的神話，抒寫其遠志中挫，壯志未酬之慨，並對照出「狐鼠蜂蟻」之輩安度天年的不平。其中既紹承鮑照詩作之遺緒，也在傳統〈行路難〉的擬作中，寄寓謫囚南楚的不平之氣。而〈其二〉更藉朝廷惜才與否，指涉「同輩諸公一時貶黜之意」⁸³。由上所述亦可見柳宗元以木石緘默的自喻背後，實蘊涵著作者胸中噴薄欲出的不平之氣，甚至不白之冤。然則緘默掩抑卻是他身處謫囚困境，企盼超脫的不二法門，從而具體深刻地映射柳宗元深加掩抑之一焦慮面向。

木、石二者是永州八記中不可或缺的書寫要素。靜默矗立於永州山水之間的奇木怪石，亦不時成為柳宗元謫囚永州沉默自持的具體寫照。例如〈鈇錡潭西小丘記〉載柳宗元與李、元等人喜獲西小丘時：

李深源、元克己時同游，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剷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之遨遊，舉熙熙然迴巧獻技，以效茲丘之下。

文中柳宗元的木、石隱喻，互有嘉穢美惡之別，頗富楚〈騷〉香草美人之意，而據前文所述，他在〈行路難三首·其二〉已有以木石隱喻國家人才，以山丘指涉長安朝廷，與此文的長安虛擬，幾可謂如出一轍，相得益彰。因此嘉木奇石之擺脫幽黯而嶄露頭角，應可視為柳宗元的自我指涉。然而這些奇石嘉木之得以重見天日，再現風華，乃在靜默自持之後，遇人而顯，俟時而出，並非取決於自我之主動結果；換言之，始之

⁸² 參見柳宗元〈行路難三首〉，楊家駱主編《柳河東全集》（台北：世界書局，1999），卷43，頁976-977。

⁸³ 同上註，頁976。

以靜默，並俟時成於人事，正是文中木石的自處之道，也正是柳宗元當時的心境寫照。這些特殊而不群的山水木石，亦寓有待人事之宣美傳播，以玉成其美。然則這些山水敘寫特徵，其實正映射出柳宗元筆下山川景物的被動質性及其有待而起之深層意蘊。於是幽深隱曲的永州山水特性，一一成為召喚柳宗元情志共鳴的具體關鍵，又復同時作為他瘖默自處，期待知音，並放眼未來的重要隱喻。因此柳氏所謂「以茲丘之勝，致之澧、鎬、鄂、杜」云云，即隱約透露出柳宗元以緘默自慎，展望長安的內在焦慮，適與其木石書寫，互為表裡，相互發明。

永州八記中的木石隱喻，既為柳宗元緘默沉潛的自我指涉，因此〈至小丘西小石潭記〉「全石為底」、「竹樹環合」的小石潭，固然幽麗，但美則美矣，若久乏問津，將永鎖愁城，終無重見天日之緣。此亦以緘默之道自持的柳宗元另一內在焦慮，並巧妙地隱喻於山水敘寫之中：

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淒神寒骨，悄愴幽邃。

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⁸⁴

小石潭因淒清幽邃不宜久居，正如永州的柳宗元深恐長期謫囚，永無重返長安之日，這一深具時間意義的內在焦慮，亦可由他稍後的〈囚山賦〉中篇末所述：「積十年莫吾省者兮，增蔽吾以蓬蒿」、「誰使吾山之囚吾滔滔兮」中獲得印證。

其次，有時柳宗元筆下嘉木美石世界之發現與傳世，又具現為桃花源式的虛擬構思。換言之，沈默自持的木石之美，恍如長年幽閉於武陵深處，與世隔絕的桃源世界，唯有當與漁人邂逅的機緣到來，桃源的世外美景，才得以為世人所悉。〈袁家渴記〉中的嘉木美石就是其中的具體典範⁸⁵。柳宗元藉陶潛筆下武陵漁人偶遇桃花源的舊典，重塑其永州謫囚的幽麗自許與緘默自持，一方面固應受到前賢陶潛創作之直接啟沃，但其同行親友吳「武陵」者，又有同名之巧合，是否因而巧妙牽動其武陵漁人的桃源浮想？茲因柳宗元本人並未具體說明，固然難以確

⁸⁴ 參見柳宗元，(同註2)，頁5871。

⁸⁵ 柳宗元〈袁家渴記〉：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上生青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其樹多楓柎石楠、榿櫨樟柚，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而蔓生，膠輻水石。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苒眾草，紛紅駭綠，蕩勃香氣，衝溝旋澗，退貯谿谷，搖颺葳蕤，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余無以窮其狀。永之人未嘗游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世。(同註60)，頁5871。

認，但或可略資談助。然則由上論述，大體亦可略窺陶潛筆下之桃花源，終竟是柳宗元永州八記中山水世界之一重要構成元素。

六、結論：焦慮書寫下的謫囚風景及其賦家身影

藉由柳宗元〈囚山賦〉等辭賦及其相關詩文撰述所揭示的途徑，不僅可以審視永州八記的創作背景與情志原委，從而不僅可以更具體而準確地掌握柳氏永州山水遊記背後經緯交織的主、客觀因素及深層底蘊，同時亦有助於更細緻地解讀作者寄寓於永州八記書寫中間的山水動靜及其情志轉換。尤其是在永州山水奇譎瑰瑋的觀照中，不僅深刻映射出作者之謫囚身影，亦在永州山水與作者情志的虛實交錯之中，浮現出長駐心靈深處之幽黯國度。因此永州八記裡此起彼落的山水幽麗，終竟是柳宗元謫囚困境中美麗卻又短暫的春光一現。於此，山水固為柳宗元永州八記追逐捕捉的主要具體對象。但換另一角度而言，永州山水亦復巧妙地洩露了柳宗元心靈花園的最底層秘密。因此，藉由〈囚山賦〉等賦及其相關撰述的考察面向，不僅應是掌握柳宗元永州山水觀照取向的重要關鍵，更有助於深入剖析閃躲於永州風景書寫背面的謫囚焦慮。

永州八記的此一特殊底蘊，一方面即需藉由他撰於南寓永州的〈囚山〉等辭賦及其作品中自我揭示的謫囚心境，同時更待進一步將這兩者加以對照與整合，並輔以相關的柳氏書札等文獻資料，則柳宗元深潛於永州八記山水觀照背後的謫囚焦慮，不僅得以一一浮現，並且從而亦映射出作者於山水實景的敘寫當中，曲折而深刻的謫囚心影。這些構成了永州八記游移於風景與焦慮二者之間的特殊書寫姿態。至於其內在意蘊則誠如他撰於永州，亦深具虛構設問答、鋪采摛文等等辭賦色彩的〈對賀者〉所述：

柳子曰：子誠以貌乎，則可也。然吾是若是而志者耶。……
吾之罪大，會主上方以寬理人，用和天下，故吾得在此。凡吾之貶斥，幸矣。而又戚戚焉何哉。……蒙恥遇僇，以帶不測之誅，苟人爾有不汗栗為例僇者哉。吾嘗靜處以思，獨行以求，自以上不得自列於聖朝，下無以奉宗祀，近丘墓，徒欲苟生幸存，庶幾似續之不廢。是以儻蕩其心，倡佯其形。

茫乎若昇高以望，瀟乎若乘海而無所往。故其容貌如是。……
 嘻笑之怒，甚乎裂眦。長歌之哀，過乎慟哭。庸詎知吾之浩浩，非戚戚之尤者乎。⁸⁶

柳氏文末歸旨於「庸詎知吾之浩浩，非戚戚之尤者乎。」即指出八記之首〈始得西山宴遊記〉中灑然與天地自然合一的情志取向，僅可視為外層的作品表象，而在作者以樂遊為主的山水敘寫及其風景鋪陳之下，實掩抑著欲蓋彌彰的深層謫囚焦慮。然則這一被作者巧妙淡化以致掩飾處理的謫囚心影，則顯然有待結合他同撰於永州的〈囚山〉與〈歸夢〉、〈懲咎〉、〈解崇〉、〈閔生〉等主要辭賦，特別是其中作者所展現內在生命情懷的憂遊鋪陳。因此藉由同樣富於展現鋪陳特性之永州八記與永州辭賦二者間的互為表裡，讀者才得以更完整而清晰地洞鑒柳宗元沈潛於山水遊記之下的謫囚焦慮，與其幻化於豐富風景樣態之間的謫囚心影。同時藉由柳宗元同撰寫於永州時期兩種文類間之對照與整合的論述重構，及其所映照而出的「風景與焦慮」書寫主題，則前述遊記與辭賦二者的離合同異之際，儼然亦勾勒出近似賦家從容於「體物」與「寫志」的書寫經緯與寫作脈絡。於是我們在永州八記文有詩情的觀照外⁸⁷，尚可洞鑒其中潛藏辭賦意蘊的另一面向，及其具現柳宗元作為唐代傑出辭賦家的另一身影。⁸⁸這些既構成了永州八記游移於風景與焦慮二者之間的特殊書寫姿態，亦凸顯柳宗元永州遊記與辭賦二者間互為表裡的重要對應關係，並從中映照屈《騷》憂與遊的傳統書寫意蘊及其「體物寫志」的辭賦身影。

註解 [U1]:

註解 [U2]:

⁸⁶ 參見柳宗元〈對賀者〉：「柳子以罪貶永州。有自京師來者，既見，曰：余聞子坐事斥逐。余適將唁子。今余視子之貌，浩浩然也。能是達矣。余無以唁矣。敢更以為賀」，楊家駱主編《柳河東全集》（台北：世界書局，1988），頁150。

⁸⁷ 清·林紓評〈小石潭記〉謂：「文有詩境，是柳州本色。」（同註18），頁120。

⁸⁸ 參見馬積高《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頁312。

審查意見摘要

第一位審查人：

本文乃參照柳宗元被貶於永州所撰之辭賦與遊記，以及〈與李翰林建書〉等文本，探討深藏在寫景的永州八記，其底層所透露的謫囚焦慮。其研究進路與策略頗見新意，應具有啟發性，擬予推薦。但有若干意見，提供作者斟酌修改：(一) 柳氏被貶於永州，或許是因為其在〈與李翰林建書〉中，稱其地為楚之最南，於是本文乃一再以「楚囚」為稱。「囚於楚」不同於「楚囚」，楚囚早已有約定俗成的意涵，除非柳氏曾以楚囚為喻，否則「楚囚」之稱，有待斟酌。(二) 綱目如何銜接使論文之論述更具條理？相關文本應如何引用？可能都還有改進的空間。如論文層次之說明；同一段文本，避免再三徵引（如〈鈞姆潭西小丘記〉「噫！以茲丘之勝，致之澧、鎬、鄆、杜，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一段，至少引三次）。若能重新檢查修整，可使論文更臻完美。

第二位審查人：

本文從歷史背景作考察，既能熟習柳集作品，復能參考近人著作，尤其分析柳文作品頗為深入，信而有徵，是篇勤敏用心的佳作。謹提供修改建議如下：(一) 本文旨在討論柳宗元永州時期見到美景時所產生的焦慮，這點實不受限於某類文體，其生活經驗可發抒於詩、散文（含遊記與書信）、賦……等。而今題目只限於「山水遊記與辭賦之對讀」，於此有何深意？似可加以說明。(二) 結論云：「因此永州八記裡此起彼落的山水幽麗，終竟是柳宗元謫囚困境中美麗卻又短暫的春光乍現。」既然是「此起彼落」以狀其多，又如何是「乍現」？實則，結論可以成立，只是敘述有語病。若能先歸納柳宗元作品的寫作時間，考察其心境常有波動轉折的現象，由此申述「風景與焦慮」實屬「互動」、「流動」的現象，則上述問

題可迎刃而解。